

鲁迅在他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，有种工作尚未被鲁迅研究界多数人充分了解和认识，即鲁迅整理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多品种、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和贡献。迫切地有待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。

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和《六朝墓志目录》考释

——展现鲁迅石刻研究成果的一斑

■ 叶淑穗

许广平先生在她的《关于汉唐石刻画像》一文中曾写道：鲁迅“为中国古代石刻画像探研曾下过很多苦心，目下所保存的除原拓碑帖画像外，又有先生亲自编好的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及未完成的《六朝墓志目录》……可惜限于财力未能在他生前整理付印，到如今，艺术研究上还是一件很可遗憾的事。”我们由衷地感谢许广平先生将这些珍贵的手稿完整地保存下来，使鲁迅的真迹得以传世，使后人得以继承先生研究的成果。但让人们感到遗憾的是，学界至今对鲁迅“曾下过很多苦心”的成果，还未展开研究，对它的庐山真面目并没有向世人展示，更谈不上研究了，这应当是使我们感到愧疚的。

那么许广平先生所说的“鲁迅亲自编好的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及未完成的《六朝墓志目录》”是什么样的稿本，它的价值又如何呢？

《六朝造像目录》与《六朝墓志目录》稿本内容概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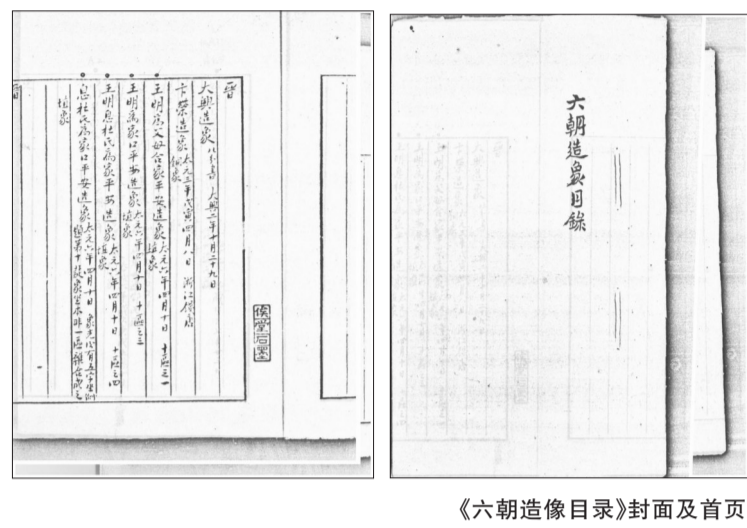
一、六朝造像目录。此系鲁迅将六朝时期——即三世纪初到六世纪前后三百余年间，古人所雕塑的佛像的铭记或称造像记，以目录的形式辑成的稿本。编辑时间约在1918年间。现有稿本三册，计有手稿190页。经过仔细研究后，认为从内容上可分成三部分：草稿本、滕清稿本、抄录造像拓本的记录本。原件存国家图书馆。

1. 草稿本。计有手稿55页，写在乌丝栏竹纸上，纸长25厘米，宽32厘米（折叠成双页）。记录从晋、前秦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后魏、东魏、北齐、北周至隋的造像名目。编辑体例是以朝代划分，每个朝代内又按年号、时间排列，并详细注明造像名称、出土地点及现存处等。每页手稿的右口均写明该页的朝代及时年号。稿纸的天头或相应年号时间的两侧，均有添加的造像年目。因而草稿本给人的总体感觉是，整页纸均布满各种造像名目的注录，很少空白。虽有添加及涂改，但并不凌乱。

2. 滕清稿。计有手稿102页，仍用乌丝栏竹纸书写。封面有鲁迅书“六朝造像目录”六字。首页钤有“侯堂石墨”印。稿本记录了从晋至隋的造像名目1331条。编排方式和记录的详细与草稿本同。不同的是整本字迹清晰，编排整齐，没有涂改的痕迹。只是在造像名称上方记了一些特殊的记号，如“△”、“△”、“△”。经考证注有“。”记号的，是为选出准备抄录造像的拓本。经核对有“。”记号的造像拓本，绝大部分鲁迅已抄录，并登记在“抄录造像拓本的记录稿本”中；记有“。”记号的造像名目，经整本查考得知，系标明此造像出自河南洛阳龙门山石窟的大佛洞（今称万佛洞），在1917年3月18日《鲁迅日记》曾记有“午后往留黎厂买洛阳龙门山石刻全拓一份，大小一千三百二十枚，直卅三元”——这些记有“。”记号造像名目就包含其中；记有“△”的记号系标明此造像是重复注录。

3. 抄录造像拓本的记录稿本。手稿33页，写在白宣纸上，纸长25.5厘米，宽16.3厘米，稿本整洁，字迹清晰。每个条目均详细注明造像的名称、朝代、年号、时间及出土地点等，与前二个稿本不同的是，在编排上是不按朝代、年号与时间的。这说明鲁迅是依照抄录造像拓本的时间先后记录的。稿本共记录了抄录的造像拓本名目311份。与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收入的实际抄录的造像拓本相符，后者还多33份。此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系鲁迅生前已按门类（即碑、造像、墓志），按朝代、年号和年月基本编排好的，生前未能出版。1987年由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编辑，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。

二、六朝墓志目录。墓志系放在古人墓中，刻有死者传记的石刻，石刻上记有死者的姓名、籍贯和生平，被人们看成是最原始的历史资料，均有添加的档案，可以补史书之不足，同时也是墓葬断代的确证。鲁迅将其搜集起来辑成目录。现存稿本32页，仍用乌丝栏竹纸书写。从内容上可以分



《六朝造像目录》封面及首页

成二部分：一为草稿本，一为抄录墓志拓本的记录本。草稿本计有手稿13页，封面有鲁迅手书“六朝墓志目录”，稿本收录从宋、梁、北魏、东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郑等朝代的二百余条墓志的条目。按朝代编排，详细地记录墓志的名称、年号、年月及出处、稿纸的天头相应之处仍有多处添加，因而可以确定此为草稿本。这个稿本的特点是几乎每个墓志名称的名下，均有该拓本购买的时间及价格的记载。如记“乙卯十一月二十日收五角”，所记年份为“乙卯”及“丙辰”，即1915年、1916年。这些记录的年、月、日、金额与《鲁迅日记》所记完全相符；

抄录墓志拓本的记录本，手稿18页用的是白宣纸，纸长25.5厘米，宽16.5厘米。记有鲁迅抄录的墓志拓本名目187份，均见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的墓志类中。

鲁迅辑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六朝墓志目录》的意义

对于鲁迅辑《六朝造像目录》的滕清稿，人们更多的认为它是一本已经编辑完成或者准备出版的稿本。但从整个稿本实际内容分析，本人认为，可以确定这个稿本并非定稿。全稿本收集的造像条目1331条，其中有造像名称而无注录的有192条，仅在书口注明“无年月”；所辑的造像目录几乎每个朝代后面均有补充的条目，并在书口注明此页为“补”。计有北魏补63条、西魏补7条、东魏补201条、北齐补58条、北周补5条、隋补28条。这些“补”的特点与前面的年号、年月及出处、稿纸的天头相应之处仍有多处添加，因而可以确定此为草稿本。这个稿本的特点是几乎每个墓志名称的名下，均有该拓本购买的时间及价格的记载。如记“乙卯十一月二十日收五角”，所记年份为“乙卯”及“丙辰”，即1915年、1916年。这些记录的年、月、日、金额与《鲁迅日记》所记完全相符；

抄录墓志拓本的记录本，手稿18页用的是白宣纸，纸长25.5厘米，宽16.5厘米。记有鲁迅抄录的墓志拓本名目187份，均见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的墓志类中。

《六朝墓志目录》，正如许广平先生所说：“是未完成的”一部石刻时期。虽是草稿本，仍汇集了六朝时期各个阶段所发现的墓志石刻。鲁迅将这些墓志拓本，一一购得，并作记录。这不只说明这些拓本的难得可贵，也说明这部《六朝墓志目录》的精确。

《六朝墓志目录》，正如许广平先生所说：“是未完成的”一部石刻时期。虽是草稿本，仍汇集了六朝时期各个阶段所发现的墓志石刻。鲁迅将这些墓志拓本，一一购得，并作记录。这不只说明这些拓本的难得可贵，也说明这部《六朝墓志目录》的精确。

撰写了那么多著述，获得了那么多的成果，今人或会想象童先生一定有很好的读书治学条件。其实，除了幼年的岁月之外，童先生大约是民国年代生活最贫困、治学条件最差的学者之一。二十一岁起，他先后在南京财政部总务司、印花税司、当涂县政府、象山渔业管理局、浙江图书馆印刷厂等充任课员、文牍和校对等，虽是养家糊口所必须，而他的兴趣却在古书的考证上，此期间完成的《虞书疏证》《殷本述》《评顾著〈尚书研究讲义〉第一册》《〈国语〉与〈左传〉问题后案》二戴礼记于东汉》等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述，都是在业余时间里撰写的。一个普通的校对员能撰写如此高水平的学术文章，最终引起顾先生的注意，随即聘童先生至北平任他的学术助理。这样，大约有两年时间（自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），童先生有较为安顿的生活，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了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顾先生离京赴川，童先生只得启程南归。归途中，他花二个月的时间，将随身带着的资料写成《中古绘画史》。其后，为躲避日寇的侵逼，跟随逃难人群避居到桐庐，约半年之后，再返北大渡口（时童先生的眷属都住在安徽大渡口竹山山庄），途中又被日军拘于难民收容所，后经营救，由芜湖转南京再转到上海。1939年，他经吕思勉先生的介绍到光华大学任教，这样，也略有二年的时间，他可以安顿且专心致志于学问。然好景不长，二年后上海又沦为“孤岛”，光华大学停办，童先生只得辗转奔波，自行谋生。他先后在宜兴张渚念劬中学和常州横林的惠林中任教，靠他低微的中学教师的工资，维持着五口之家的生计。不久，抗战胜利，童先生却再度失业。直到1946年，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聘请童先生为历史部主任，童先生重返上海。但那是明珠薪桂的年代，童家的生活顿时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，为了养家糊口，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馆的工作外，他又兼任了好几份工作。沉重的家庭负担将他身体压垮了，原本就神经衰弱的他，在这时发展到强迫观念症。他一边受着疾病的折磨，一边仍撰写古史、古籍、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论文，还新开辟了瓷

器史的研究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他在自思强迫观念症的状态下，凭借他顽强的自制力，又进入到精神病学、心理学的研究领域，居然一如他在其他学术领域一样，写过一系列精神病学、心理学的著述。

鲁迅研究石刻的独特之处及其成果

首先，鲁迅对石刻的认知有别于前人，他更看重石刻所呈现的图画、古代佚事、民俗文化及其历史价值。蔡元培先生在《记鲁迅先生轶事》一文中写道：“我知道他对图画很有兴会，他在北平时已经搜辑汉碑图案拓本。从前记录汉碑的书注重文字，对于碑上雕刻的花纹毫不在意，先生特别搜集，已获得数百种”。中国最早集录汉魏石刻专著是宋代洪适所著《隶释》《隶续》，继有清代王昶的《金石萃编》和陆增祥的《八琼室金石补正》等等近百种石刻专著，这些专著在石刻研究上主要关注的是石刻上的书法文字。鲁迅则不然，而是从更广泛的意义对石刻展开研究。

第二，鲁迅开创了石刻分门别类研究的先河。鲁迅从对各地、各类石刻深入探讨中掌握了各类石刻独有的特性和内涵，因而将其分别以碑、造像、墓志、画像分门别类展开个性化的研究。例如鲁迅的造像目录、墓志目录等等，特别对汉画像的研究，他是以画像种类来区分，如：阙、石室、门、摩崖等（见鲁迅拟《汉画像考》），而不仅仅是按地区。正是由于鲁迅对汉画像的发掘、引荐和推崇，促使中国新兴美术的发展，使其在今日的美术领域中大放异彩。这足以证明对石刻的分门别类进行研究，更能彰显各门类独有的特色，表露其深层次精髓。

第三，鲁迅在石刻研究的顺序上独树一帜：首先是竭尽全力掌握该门类石刻的现存情况——即从事各种石刻目录的收集与编辑，鲁迅不只编辑了《六朝造像目录》《六朝墓志目录》，还编辑了《唐造像目录》（现存手稿110页）、《直隶现存汉魏六朝石刻》（现存手稿80页）、《六朝墓志目录》（现存手稿26页）、《越中金石记目录》（现存手稿36页）、《各省金石目录》（现存手稿24页）、《各县金石录稿抄》（现存手稿63页）、《石刻目录》（现存手稿40页）、《汉画像目录》（现存手稿35页）等等。在收集目录的基础上，进而依据目录中所收集的名目有

目的地从四面八方搜集、收购原拓本：先从1915年至1918年集中购买碑、造像、墓志、画像等拓本，对于汉画像的收集则更延续到1936年以至他生命的最后时光。鲁迅以他大半生的精力收集各种石刻拓本，计有碑拓本593种1001张，造像拓本2017种2316张；墓志拓本347种510张，汉画像406种697张；再者又从这些拓本中选出各门类中有代表性的拓本——即在目录稿本中划“。”的那些拓本一一进行抄录。用的是长25厘米、宽32厘米的竹纸，字迹工整，有的甚至是仿碑体。鲁迅的仿碑字体，可以说是惟妙惟肖，无以伦比。周作人目睹过鲁迅抄碑的情景，更了解鲁迅抄碑的意图。他在《鲁迅的故家》一书中，“抄碑的方法”一节中写道“他抄了碑文拿来和王兰泉的《金石萃编》对比，看出书上错误的很多，于是他立意要来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，他的方法是先用尺量定了碑文的高度，共几行，每行几字，随后按字抄录下去，到了行末便画一条横线，至于残缺的字，皆存存今，补缺而今微存形影的，也都一一分别注明……鲁迅采用这些而更是精密，所以他所预定的自汉至唐的碑录如写成功，的确是一部标准的著作，就是现存已写的一部分我想也还极有价值。”历时四余年（1915年—1918年）间，鲁迅共抄录碑261种1367页，造像344种1267页、墓志190种1035页，总共抄石刻拓本3669页，均见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。在他抄录的每个拓本的后面，均附有历年有关专著对该拓本的考评。而鲁迅自己的校文则很少附于其后，而是另写一册“石刻校文手稿”99页（见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）收录校文1036条。这一部经过鲁迅精心抄录，“下过很多苦心”“探研”并认真校勘的《鲁迅辑校石刻手稿》，应当就是他“立意要精密的写成一个可信的定本”吧！

这是鲁迅留给后人的一部经典，有待我们去研究去传承。鲁迅在他对于人类的伟大贡献中，有种工作尚未被鲁迅研究界多数人充分了解和认识，即鲁迅整理祖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的多品种、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和贡献。迫切地有待后来的研究者进一步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探讨。

中国史坛的一位旷世奇才

——读《童书业传》有感

■ 张新华

今年是童书业先生诞辰五十周年，恭读童英女士编写的《童书业传》（修订本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，下文简称《童传》）和先生的著述，将阅读时所做的笔记整理成文，一如炷香祭奠，谨表我对前辈学者的缅怀和敬慕之情。

说童书业先生是史学界的旷世奇才，读者首先想到他那“奇特”的超强的记忆力。据《童传》的记载：史念海先生在北平禹贡学会时，曾与童先生一同赴张园酒宴，席中童先生偶然问起《尚书》中某几个字，童先生马上说出，该书中共有若干，接着又举出某篇有几个，在哪一句中，童先生马上说出，该书中共有若干，接着又举出某篇有几个，在哪一句中，说得完全正确，举座皆惊。山东大学的韩连琪先生曾是童先生的同事，闻说童先生有超强记忆力，不敢十分相信。一日，他与童先生打赌，取来十三经，任翻一篇，读一句，童先生果真能按着一字不差地背出下文。20世纪60年代，徐鸿修先生毕业留校，单位安排他当童先生的科研助手，徐先生对先生的超强记忆力也是半信半疑——尤其是此时童先生已年过半百，还能有这样的记忆力吗？一次，他便借请教为名，试探童先生的记忆力。他拿着古书，指说《禹贡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禹贡》；指说《泰誓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泰誓》；指说《禹贡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禹贡》；指说《泰誓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泰誓》；指说《禹贡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禹贡》；指说《泰誓》，童先生就背出《泰誓》。只要念到某部，童先生就能马上说出该部首的页码。或说《尚书》十三经等古书，老一辈的史学家都是幼时背诵熟读过的，成年之后仍能记忆，或终身能背诵如流，虽也称奇，然也偶有所闻。然对于新出的书籍，如恩格斯的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

起源》《苏联共产党党史》等，童先生只要看过一遍，便能大段大段地背诵，这不是一般靠熟读背诵的功夫而获得的记忆了。当时，山东大学华岗校长很赏识童先生超强的记忆力，曾请童先生在山东大学医学院传达他的政治报告，童先生居然能几乎一字不漏地复述。这种超强的、甚至有点神奇的记忆力，除了归因于天赋，别无解释！

童先生的超强记忆力，不可误解为超强的复述能力，否则，只能比肩于计算机了。童先生的“奇特”还在于他有超强的洞察力，那就是刘知几所说的“史家三长”的“史识”了。梁启超说“史识”是史学家的一种“读书得间”的观察力（《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》）。唯有此观察力，方能读出史料中字里行间的真含义，找出隐含于文字背后的真实史。比如，关于春秋末年吴越国都的所在，传统的说法是吴都苏州，越都绍兴，一南一北纵向相对。但童先生在读史料时，见《吴语》中记载伍子胥自杀时云：“以悬吾目于东门，以见越之入吴，国之亡也。”又见《史记》载子贡为鲁说吴王云：“臣请东见越王”。他便起了疑问：“若当时吴都苏州，越都绍兴，则吴在越之正北，自吴至越，安得云‘东’？”又读《吴语》记载王勾践袭吴之役，有“沂淮以绝吴路”“沂淮以袭吴”等语。水行自下逆上谓之为“沂”，“淮”是淮水，“江”是长江，要“沂淮”“沂江”，则当时吴都已在江北了。又读《吴越春秋》云：“越闻吴王久留未归，乃悉士众，将踰章山，济三江而欲伐之。”“三江”即北江（今长江下游北干）、中江（即溧水）和南江（即吴淞江）的

合称，称“济三江”，那越之伐吴必须过“三江”，可见春秋末期吴都已在江北了。复读《左传》等史料记吴、楚交兵，其地似多在淮河流域；若按岗地地形而论，两国当沿长江而战，不当循淮水而争。于是，他写成《春秋末吴越国都辨疑》一文，提出春秋末期吴曾徙都江北的邗城（今扬州附近），越在太湖流域。这个推断，全由对“悬目”“沂江”等片言只语的细读中洞察悟入。《吴语》《左传》《史记》等，都是普通的史籍，常用的史料，但童先生凭借他超强的洞察力，悟出新问题，揭示新史实，这就达到了严耕莘先生所称颂的“看人所未能看得到的书，说人所未说过的话”的治学境界了（《治史三书》）。

童先生的“奇特”，还在于他的研究领域极广，却能在每一个领域里都有不同凡响的创获。他当顾颉刚先生的学术助理，不只是收集、整理史料，每每能融入自己的研究心得或创见，提供给顾先生参考。顾先生一向有不据后学发明为已有之美德，凡是童先生的研究心得而采入他著述的，都一一注明。童先生研究的领域涉及古史、古籍考辨、古代历史地理、古代经济史、古代瓷器史、先秦思想史、历史理论、中国美术史以及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等领域，对宋史、明史也有涉历。而每一个论域，他都能新见迭出、深诣创获，达到一流的学术水准。他参与所必须，而他的兴趣却在古书的考证上，此期间完成的《虞书疏证》《殷本述》《评顾著〈尚书研究讲义〉第一册》《〈国语〉与〈左传〉问题后案》二戴礼记于东汉》等专业性极强的学术著述，都是在业余时间里撰写的。一个普通的校对员能撰写如此高水平的学术文章，最终引起顾先生的注意，随即聘童先生至北平任他的学术助理。这样，大约有两年时间（自1935年6月至1937年7月），童先生有较为安顿的生活，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了。“七七事变”之后，顾先生离京赴川，童先生只得启程南归。归途中，他花二个月的时间，将随身带着的资料写成《中古绘画史》。其后，为躲避日寇的侵逼，跟随逃难人群避居到桐庐，约半年之后，再返北大渡口（时童先生的眷属都住在安徽大渡口竹山山庄），途中又被日军拘于难民收容所，后经营救，由芜湖转南京再转到上海。1939年，他经吕思勉先生的介绍到光华大学任教，这样，也略有二年的时间，他可以安顿且专心致志于学问。然好景不长，二年后上海又沦为“孤岛”，光华大学停办，童先生只得辗转奔波，自行谋生。他先后在宜兴张渚念劬中学和常州横林的惠林中任教，靠他低微的中学教师的工资，维持着五口之家的生计。不久，抗战胜利，童先生却再度失业。直到1946年，新任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聘请童先生为历史部主任，童先生重返上海。但那是明珠薪桂的年代，童家的生活顿时陷入了极度的困苦之中，为了养家糊口，除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博物馆的工作外，他又兼任了好几份工作。沉重的家庭负担将他身体压垮了，原本就神经衰弱的他，在这时发展到强迫观念症。他一边受着疾病的折磨，一边仍撰写古史、古籍、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论文，还新开辟了瓷